

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

储泰松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 / 储泰松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5.8

ISBN 7-81110-076-2

I. 唐... II. 储... III. ①西北方言—语音—研究—
—陕西省—唐代②西北方言—语音—研究—陕西省—五
代(907~960) IV. H1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3196 号

本书由安徽省重点学科安徽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建设基金资助出版

唐五代关中方音研究

储泰松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241
发行部 0551-5107784

电子信箱 ahdxcps@mail.hf.ah.cn

责任编辑 南 亩

责任校对 赵凤云

封面设计 孟献辉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

照 排 合肥述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72千

版 次 200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1110-076-2/H·107

定价 14.5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 [1] 序

- [1] 第一章 绪论
 - [1] 第一节 唐五代语音及关中方音研究小史
 - [6] 第二节 本书采用的材料来源及其校勘
 - [15] 第三节 唐五代关中语音

- [29] 第二章 唐五代关中僧人的音义反切系统
 - [30] 第一节 隋唐音义反切研究的观念与方法
 - [41] 第二节 音义反切的声母系统
 - [61] 第三节 音义反切的韵类系统
 - [80] 第四节 反切所见特殊语音变化

- [96] 第三章 唐五代关中文人的诗文用韵系统
 - [96] 第一节 关中文人里籍及入韵作品数据统计
 - [101] 第二节 韵文体裁的鉴定与押韵韵例(韵段)
 - [103] 第三节 关中文人的押韵部类
 - [132] 第四节 关中文人异调相押的类型及实质

- [137] 第五节 唐五代关中文人的用韵特征
——通语韵类分合及方音面貌
- [157] 第四章 唐五代关中僧人的梵汉对音系统
- [157] 第一节 关中僧人译音的辅音对音情况
- [166] 第二节 关中僧人对音的声母系统
- [172] 第三节 关中僧人对音的韵母系统
- [189] 第五章 唐五代关中方音的声调特征
- [189] 第一节 律诗失律的平仄格式及其类型
- [193] 第二节 失律诗歌的辨别及其数据统计
- [198] 第三节 失律现象与关中语音的声调特征
- [200] 第四节 唐五代关中方音的声调层次
- [206] 第六章 结语
- [213] 参考文献
- [228] 后记

第一节 唐五代语音及关中方音研究小史

一、关中的地理范围

“关中”是一个笼统的地理概念，其具体范围历史上有三说：

1. 徐广说，见于《史记·项羽本纪》“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集解》引徐广曰：“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函谷关，战国秦置，在今河南灵宝东北，当唐虢州弘农县；武关，秦置，在今陕西丹凤县东南，当唐商州（山南东道）；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当唐岐州；萧关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另，《三辅旧事》亦以为“西以散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

2. 潘岳说，见于所著《关中记》（《说郛》六一）：“东自函关，西至陇关。”陇关，今陕西陇县西，当唐陇州。

3. 胡三省说，见于《资治通鉴注》（秦二世皇帝二年）：“西有陇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临晋关，西南有散关。”临晋关，在今陕西大荔县城东黄河西岸，当唐同州冯翊县。

三种说法均是以函谷关为东界，但西、南、北则有异。不过，它们界定的关中范围主体均属唐代京畿道。本文从行政区划考虑，只以京畿道为限，即京兆府、同州、华州、邠州、岐州，共一府四州，和今天的关中盆地范围大致相当。

关中地区，唐代以前屡为京畿重地——周王朝发源于岐山，秦、西汉、苻秦、姚秦、前赵、西魏、后周、隋诸朝均定都于长安，东汉、西晋以长安为陪都——使得这一地区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中方言随着隋唐经济文化的鼎

盛,其地位也逐步提高。唐代文明,至盛唐臻于极致,关中方音也具备了成为通语基础方言的条件(黄笑山 1995)。因此,研究唐五代的关中方音系统,对于考察中古秦晋方言、弄清唐代的通语系统及其变化,进而确定关中方音的层次及其在通语系统中的地位,均有着重要意义。

二、唐五代语音研究的现状及其不足

唐代语音上承《切韵》音系,下启近代语音,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前贤对唐代语音的研究,开始于 1920 年马伯乐《唐代长安方音考》,其后,唐代语音的研究渐为学者重视,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起来。

1. 音义反切的研究

唐代的音义书较丰富,首先引起学者重视的是佛典音义:黄淬伯于 1931 年发表《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断其音系为秦音,而与《切韵》迥异;1948 年周法高作《玄应反切考》,认为玄应音系与《切韵》系统基本相似,不见有大的语音变化。由于人们对《切韵》音系性质存在不同的看法,因而与之时代相若的唐代音义反切就成了考察这一问题的重要线索,使得这些音义反切得到了系统的归纳整理,如朱翱反切(严学窘 1936,张世禄 1943、1944,王力 1982)、李善《文选注》(张洁 1998,徐之明 2000)、颜师古《汉书注》(钟兆华 1982,谢纪锋 1990、1992)、何超《晋书音义》(邵荣芬 1981)、张参《五经文字》(邵荣芬 1964)等等,唯在研究方法与理念上尚存在一些分歧。

2. 诗文押韵研究

唐代是诗歌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不仅诗作众多,而且名家辈出。唐代诗文用韵研究起步很早。张世禄 1944 年就发表了《杜甫诗的韵系》,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陷于沉寂。进入 80 年代以后,以鲍明炜《唐代诗文韵部研究》为标志,唐代诗文用韵研究呈现出新景象:既有个案的研究,又有断代的研究;既有单个文人用韵特征的考察,又有某个时期所有文人用韵系统的归纳;既研究诗文用韵系统的共时特征,又探索用韵系统历时分合演变。对通语系统中出现的一些韵类合并现象,许多论文都作了详尽的分析,如浊上变去,尤侯韵唇音字读入遇摄,流摄、遇摄的参差,元魂痕三韵间的关系,江韵系与通摄、宕摄的分合,止、蟹二摄的发展等等,在每一篇论文里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从断代来说,像鲍明炜《唐代诗文韵部研究》、金恩柱《唐代墓志铭用韵研究》、刘根辉《中唐诗韵系略说》、赵蓉《晚唐诗韵系略说》、陈海波《五代诗韵系略说》、居思信《中古韵部系统试拟》等论著,已为我们勾勒出初、中、晚唐通语韵部系统的轮廓,由于对用韵分合现象认识不一,加上时代前后有别,各家订立的韵部系统多寡不一。综观唐代诗文用韵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几点:第一,对赋文的用韵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二,重复劳动较多,如敦煌变文用韵、王梵志诗韵、白居易诗韵,研究者很多,发布的成果亦很多,而后出者新意寥寥;第三,过于重视用韵系统与《广韵》独用、同用间的联系和比较,忽视对特殊用韵现象的考察,大多是将其罗列出来,没有联系音变给予科学的解释;第四,除西北地区外,还没有人对某一地域的诗文用韵系统作出系统归纳整理,因而我们对唐代方音的认识仍是粗线条的。

3. 译音研究

译音的研究常常与音值的构拟紧密联系在一起。唐代的译音资料较多,其大者如藏汉对音、梵汉对音、日译汉音、汉越语等,其研究也很充分,其中尤以梵汉对音的研究最为深入,如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高田时雄《敦煌资料与汉语史研究》,柯蔚南《唐代西北方音的声母札记》、《唐代西北方音的韵母札记》,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刘广和《不空密咒与唐代八世纪长安音》,聂鸿音《慧琳译音研究》,尉迟治平《论隋唐长安音和洛阳音的声母系统》,王吉尧《从日语汉音看八世纪长安方音》,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等等,将译音资料与中古汉语音系间的关系作了很好的勾勒。译音音系的主要特征是:鼻音带有塞音成分,章组与精组有参差,浊塞音不送气;一二等韵、三四等韵分别合流、止流宕曾通等摄内各韵主元音各自并为一类,某些后鼻音韵尾有脱落现象。学者们认为,长安的译音材料能反映长安方音,敦煌文献能反映西北方音,而长安又位于西北,所以两者的音系基本一致,可以互相印证。但这些材料的内部差异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如日语译音有上古音、吴音、汉音、唐宋音五种,同是唐代的《古事记》(712)、《万叶集》(759年后)用的是吴音,而后于《古事记》8年的《日本书纪》(720)却用的是汉音(藤堂明保 1957);再如梵汉对音,周隋译音与唐初玄奘、义净译音如出一辙,而与不空译音相距甚远,这表明域外译音表现的是通语音系而非方言音系。译音的这种前后差异可能是通语基础方言音系的变更造成的,而通语基础方音的变更,又会导致不同层次方言成分的叠置。

上面我们全面介绍了唐代语音研究的现状,可以看出其涉及面很广,某些方面如西北方音的研究已相当深入,美中不足的

是,其一,没有人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音义反切、诗文押韵、译音等三类材料,对某一地域的具体方言音系作出更为深入的探讨;其二,隋以前的诗文用韵系统,由于存世文献不是太多,因而做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宋代诗词、元代的曲文用韵也均有比较全面的研究,为汉语语音的演变、区域方言的历史面貌及其形成过程勾勒出了有价值的轮廓,而唐五代的诗歌用韵系统虽然已做了较全面的整理,但这些研究的志趣基本着眼于押韵部类的归纳,而对特殊用韵现象透露出来的某些方音特征,基本上没有涉及或涉及很少,因而我们无法了解宋代诗词文用韵中反映出的某些方音特点在唐代的分布状况。这就有必要按地域范围重新审视这些语音材料,对某些重要区域方音音系作较全面的勾勒。

综合考量,关中方音在唐代的区域方言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唐都长安位于关中地区,是有唐一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亦不仅仅是由于唐代关中地区文化发达,文人众多,作品丰富,还由于人们认为中唐以后关中方音取得了优势地位,成为通语的基础方言,但长安话如何取代旧的通语,人们往往避而不谈。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对有唐三百多年关中方音的历时考察,了解唐代关中地区的语音系统,为汉语语音史、方音史的研究提供一些材料。

第二节 本书采用的材料来源及其校勘

研究唐五代关中方音,我们采用了三类材料:一是入韵诗文,二是音义反切,三是域外译音。

一、诗 文

A. 诗主要依据的版本是：

《全唐诗》，中华书局，1980；

《全唐诗补编》，陈尚君编，中华书局，1992；

《全唐五代词》，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中华书局，1999。

凡《补编》考订《全唐诗外编》（中华书局，1982）之误收、重收诗，均弃之不用；韵脚有疑者，先核之以诗人文集（如有的话），再核以扬州诗局本《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下简称诗局本）。如有异文且牵涉韵部分合者，则表而出之。

李瀚《蒙求》（p1992）“庞统展骥，仇览栖鹰”。此韵段押寒桓韵，“鹰”不合，诗局本（p2146）作“鸾”，是。

韦应物《至开化里寿春公故宅》（p1968）“废井没荒草，阴牖生绿苔”。此韵段押灰哈韵，“苔”不合，诗局本作“苔”，是。

B. 文依据的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全唐文》（附《唐文拾遗》、《唐文续拾》），标点适当参考中华书局版《全唐文》，个别铭文核之以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确定韵字时亦参考了文人文集：杨炯《唐赠荆州刺史成公神道碑》：“谁谓灵诞，衰落淑贞。”《杨炯集》（中华书局，1984）“贞”作“真”，此韵段押庚清韵，当以《全唐文》为长。

二、音义反切

唐代关中地区音义书很多，但大都作过研究。本论文选取

初盛唐时期作于关中地区的三部音义：慧苑《华严经音义》、窥基《妙法莲花经音义》、云公《涅槃经音义》，除慧苑音义日人水谷真成(1959)作过研究外，余皆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A.《慧苑音义》

慧苑，京兆人，生活于七八世纪，华严法藏法师上首门人。著有《新译华严经音义》二卷。《新译华严经》于证圣二年(699)译毕，音义当成于此年之后。

本书版本，据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研究，可分藏本和儒本两类，考证甚详，惜未言及赵城藏(金藏)，另《慧琳音义》卷二一至二三亦收此书。由于窥基、云公音义今只存于《慧琳音义》，为了行文前后统一，我们以《慧琳音义》所收为底本(见大正藏 54:p433—457)，校以金藏本、高丽藏本(见中华藏 59:p424—509)、拜经堂丛书本、守山阁丛书本、粤雅堂丛书本等五个版本，择善而从。如卷上：“粤以：於月反”(434a，指大正藏页码及栏数，下同)，“於”他本皆作“于”，当以“于”为正。卷下“撤睡盖：上除列、诸列二反”(456a)，诸，高丽藏同，余皆作“褚”，后者是。由于金藏复刻于宋开宝藏，而开宝藏又是第一部刻本大藏(周叔迦《佛教基本知识》)，因此，反切有异文处，多依金藏，如卷上：“馥，乎福反”(434a)，高丽藏作“復，孚房福反”(“孚”字当衍)，金藏作“房福反”，余皆作“孚禄反”，我们依金藏为正，不过这种情况很少。

B.《窥基音义》

窥基(632—682)，又称大乘基，京兆长安人，俗姓尉迟，玄奘弟子。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妙法莲花经音义》，书久不传，今唯见于《慧琳音义》卷二七，一卷。日本藏俊《注进法相宗章疏》(安元二年，1176)著录此书：“《妙法莲花经音训》，一卷，大乘基。”序云：“音以《说文》为正。”隋唐音义书引《说文》音者甚多，如《经典

释文》、《博雅音》、《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史记索隐》、《文选注》、《初学记》、《后汉书注》、《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晋书音义》等，毕沅曾据之辑《说文解字旧音》，唯不及佛典音义，胡玉缙有《说文旧音补注》，毕氏以为此《说文》音即《隋书·经籍志》之《说文音隐》，著者为沈重以前之南方人，未详是否。然慧琳以其音为正，则其音系必为慧琳所认可。

C. 云公《涅槃经音义》

二卷，书亦不传，今仅见于《慧琳音义》卷二五、二六。书题下云：“开元二十一年壬申岁终南太一山智炬寺集。”开元二十一年为癸酉，二十年为壬申（732），陈垣以为“二十一”为后人旁注，刻本致误。终南山智炬寺，《续高僧传》卷二四有“唐终南山智炬寺释明瞻传（贞观二年卒于智炬寺）”，《宋高僧传·不空》（卷一）云：“（不）空表请入山，李辅国宣勅令于终南山智炬寺修功德。”可见，唐代确有其寺。

云公，事迹无考。陈垣疑其为牛云，见《宋高僧传》卷二一。但牛云为五台山华严寺僧，传中亦无著述的记载。检《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生活于盛唐且姓名末字为“云”者仅牛云一人，这大概是陈垣立论的根据，因无实据，今不取。考戎昱《题云公山房》诗云：“云公兰若深山里，月明松殿微风起。试问空门清净心，莲花不著秋潭水。”戎昱肃宗上元年间（760—761）在长安。张谓（？—778）《同诸公游云公禅寺》诗云：“共许寻鸡足，谁能惜马蹄。长空净云雨，斜日半虹霓。檐下千峰转，窗前万木低。看花寻径远，听鸟入林迷。地与喧闻隔，人将物我齐。不知樵客意，何事武陵溪。”张氏大历六年（771）后在长安。两首诗中云公或即著音义之云公，待考。

上述三书均收入《慧琳音义》，除慧苑书外，窥基、云公二书均赖《慧琳音义》才得以见，然慧琳将二书收入其书时，是否改其

注音、释义,要当辨明之。考慧琳引《玄应音义》,多半是全盘引用,改动者约有以下几端(姚永铭 2003):一曰增加条目,二曰增补释义,三曰增补释形,四曰删改音读,如:妊娠,《玄应音义》书邻、之忍反,《慧琳音义》上如鸠反,下书邻反。娠,《王三》有平、去二读,慧琳弃去声取平声,并增“妊”字注音,此为增音例;身餒:《玄应音义》奴罪反,餒,饿也,又音於伪反。《慧琳音义》作“身餒”:於伪反。《王三》餒,奴罪反,餒,於伪反,均无又音。玄应以餒、餒同字,慧琳则纠其偏。故注音有异。餽口:《玄应音义》户姑反,《慧琳音义》户徒反。此为改反切用字而音实同也。从语音角度说,慧琳的改动并不影响音系。徐时仪(2005:61—74)对此有更详尽的分析。

《云公音义》题识云:“释云公撰,翻经沙门慧琳再删补。”《窥基音义》题下云:“《添品法华》亦同用。翻经沙门大乘基撰,翻经沙门慧琳再详定。”“再删补”、“再详定”似乎告诉我们,慧琳对两书作了修订,但《涅槃经音义》卷上首条“大般涅槃经寿命品第一”云:“慧琳云:云公所制,言虽繁,失经意,由胜诸家所音,此后南本《涅槃》三十六卷同用此音,音义依云公所制,唯陀罗尼及论梵字疏远不切者,慧琳今再依梵本翻译为正,览者详焉也。”慧琳明确申言不改动语词音义。《慧琳音义》卷二八《添品妙法莲花经》仅有词目 5 条,末云:“从此(指第三卷)后终普贤劝发品及下嘱累品并依基法师所造音,更不重述。”从这个说明看,慧琳似认同窥基注音,并没有对其“详定”。《窥基音义》所用音译词的译音系统与玄奘相合,与不空、慧琳不合,亦可证慧琳不像对《云公音义》那样对音译词作“删补”。那么,“详定”最有可能是增补、订正字形、字义,因为慧琳只是说“并依基法师所造音”。

《慧琳音义》版本较多,本文以《大正大藏经》本为底本,校以高丽藏和日本狮谷白莲社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三本差异

较小，多是形体不同，即所谓的异体字、正俗字。

窥基、慧苑均是京兆人，云公书作于终南山智炬寺，则此寺亦当是其驻锡之地，终南山隶属京兆府长安县；从慧琳引他人音义如玄应等皆京兆人来看，云公似亦当是京兆人，至少其音义为慧琳所认可。《涅槃经》、《妙法莲花经》，玄应均有音义行世，慧琳独于此两经弃玄应而取窥基、云公所著，或是二书优于玄应者也。

三、域外译音

佛典翻译，唐代臻于极盛。梵文原典源源不断地从印度和西域流入华夏大地，而从印度和西域来的译经僧人络绎于途，译经的数量与质量远远超过前代。

本书采用的梵汉对音资料是：

1.《摄大毘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入莲华胎藏海会悲生曼荼罗广大念诵仪轨供养方便会》

三卷，输婆迦罗译，一行笔授，宝月译语；刊于大正藏十八册（No. 850, p65—90），底本是正德元年（1711）丰山大学藏本。经中有189段咒语，经末附有这些咒语的梵文原文。

2.《金刚顶经毘卢遮那百八尊法身契印》

一卷，善无畏、一行译，刊于大正藏十八册（p331—335），底本是缩册大藏经，正文咒语是梵汉对照。

3.《苏悉地羯罗供养法》

善无畏译，见于大正藏十八册（No. 894），《中国佛教·善无畏》（游侠撰）以为实是善无畏依据《苏悉地经》撰集以传授弟子

者。大正藏收有两个版本：一是三卷本(p692—704)，底本是高丽藏，咒文不附梵文；另一为两卷本(p704—718)，底本是天喜三年(1055)写高山寺藏本，题首小注云：“此本与丽本异同甚繁，故别载。”文末有“请火天”等7条梵咒，但无汉译(三卷本有汉译但无梵咒)。此本咒语均为汉梵对照，除此以外，此本与三卷本汉文差别甚小。

善无畏(śubhakarāsiṃha, 637—735)，译作输波迦罗、戍婆揭罗僧诃，意为净师子。又称无畏三藏，为密教祖师之一，开元四年(716)奉师命经中亚至长安，廿三年十一月七日示寂于洛阳大圣善寺。与金刚智、不空并称开元三大士。

一行(683—727)，俗姓张，钜鹿(河北钜鹿县)人，密教五祖之一。曾师事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精于禅、道、数学、历法之学。

4.《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祇经》

二卷，金刚智译，刊于大正藏十八册(p253—269)，经中咒语皆是梵汉双书，梵文音节后附汉译。金刚智(Vajrabodhi, 671?—741)，音译跋日罗菩提，为印度密教付法第五祖，中国密教初祖。开元七年(719)由海路经锡兰、苏门答腊至广州，次年至洛阳、长安，开始密教经典翻译，并传授灌顶之秘法，共译经八部十一卷。与善无畏、不空并称“开元三大士”。

5.《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

尊胜陀罗尼，梵文 uṣṇīṣāvijayādhāraṇī 的音译，即说尊胜佛顶尊内证功德之陀罗尼，据说诵习此咒能除一切罪业等障，破除一切秽恶道之苦，所以此经屡屡被重译，民间修习者亦甚众，唐代宗大历十一年(776)，诏令天下僧尼每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

遍，于每年正月一日具载呈报。唐末五代盛行建立经幢，上刻此陀罗尼。《唐文续拾》卷十、《全唐文补遗》(一)均收有大和三年(829)《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序并记》。

此经翻译者很多，其中的陀罗尼还另见于《尊胜陀罗尼仪轨》，其前后沿革，《慧琳音义》卷三五有《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翻译年代先后》，记载了此经的首译及重译的时间与译者：

第一译：闍那耶舍译于北周武帝保定四年(564)，一卷五纸，鲍永笔授；第二译：地婆诃罗译于唐仪凤四年(679)，杜行颢笔授(实为杜行颢所译)，一卷七纸；第三译：佛陀波利和顺真译于仪凤四年，一本八纸；第四译：地婆诃罗译于永淳元年(682)，彦琮笔授，八纸；垂拱元年(685)再译，十四纸，此为第五译；第六译：义净译于景龙四年(710)，六纸；第七译：善无畏译于开元十年(722)；第八译：不空译于广德二年(764)，二十纸。“前后约二百余年已。经八度出，本经则五翻，念诵法即三种；差别唯有善无畏所译是加句，尊胜陀罗尼中加十一句六十六字，仪轨法则乃是瑜伽，与前后所译不同，多于诸本，余七译陀罗尼字数多少相似”。到宋代，施护、法天又重新翻译，前后共十译。

大正藏十九册 967—974 号收了此经的十一个版本的译文，各篇名称、译者及咒文情况如下：

(1)No967《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陀波利译；底本高丽藏，经前有序，相传为唐定觉寺沙门志静所作。由于咒文各本有异，所以经末另载宋本与明本；咒文底本 87 句，宋、明本皆 34 句。佛陀波利(Buddapāla)，汉译觉护，北印度罽宾国人，于高宗仪凤元年(676)来中国。

(2)No968《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杜行颢译；底本高丽藏；咒文 35 句。杜行颢，生卒年不详，京兆人。仪凤(676—678)中任朝散郎，行鸿胪寺典客署令。

(3)No969《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地婆诃罗译，前有彦惊序。底本高丽藏，咒文 48 句。地婆诃罗(Divākara, 613—687)，意译日照，于高宗仪凤(676—678)初年入长安，时年六十余。

(4)No970《最胜佛顶陀罗尼净除业障咒经》，地婆诃罗译，底本高丽藏，咒文 36 句。

(5)No971《佛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义净译，底本高丽藏。咒文末云：“此咒比多翻译，传诵者众。然于声韵字体，未能尽善，故更重勘梵本，一一详定。”义净(635—713)，范阳(河北涿县)人，一说齐州(山东历城)人，俗姓张，字文明。

(6)No972《佛顶尊胜陀罗尼念诵仪轨法》一卷，不空译，底本高丽藏；中有尊胜陀罗尼咒(367a—b)，共 59 句。不空(Amoghavajra, 705—774)，又译阿目佉跋折罗，密宗祖师之一。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人。与善无畏、金刚智并称开元三大士。14 岁在阇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随金刚智来华。唐开元八年(720)至洛阳。一说(赵迁《不空三藏行状》)西域人，幼随舅父到内地，10 岁游武威、太原，15 岁遇金刚智。开元十二年在洛阳广福寺受比丘戒，此后学习汉、梵经论，并随金刚智译经。

(7)No973《尊胜佛顶修瑜伽法轨仪》二卷，善无畏译，底本日本享保年间(1716—1735)刊丰山大学刊本；卷上正文有梵汉对照尊胜佛顶真言(372a—373a)，共 55 句，咒文末小注云：“此陀罗尼本中天竺国三藏善无畏将传此土，凡汉地佛陀波利已来，流传诸本并阙少，是故具本译出，流行如上。”卷末另附日本宽治八年(1094)写仁和寺藏本汉译以及灵云寺版普通真言藏本梵咒。

(8)No974A《最胜佛顶陀罗尼经》，摩伽陀国那烂陀寺三藏沙门法天译，底本高丽藏；

(9)No974B《佛顶尊胜陀罗尼》，底本东寺三密藏古写本；梵汉对照，且有注义，文末附日本建久二年(1191)后记：“师云：此